

文化产业资本化的影响及行业应对策略

张 鹏 周 郁

[摘要] 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为学界所大量引用与研究。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业导向与相关政策制定中,亦有引用“文化资本”的观点,作为文化行业进行产业资本化运行的理论依据。然而,以产业资本化作为文化行业发展逻辑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则可能带来公共信仰变更、政府公信力受损、人性普遍异化等诸多负效应。作为行业管理部门,依托现有行政资源,建立行业调查制度,对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做到“心中有数”并能够实施有效监管,是防止资本在文化行业内无序扩张的保障手段。同时,应发展“在地化”的社区文化阵地以加大优质文化的供给来平衡可能造成文化存量透支。

[关键词] 文化资本;社会价值;文化行业调查;文化行业监管;社区文化空间

文化是透视当代社会的最佳视角,亦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当代发展的顶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有社会性与实践性,文化领域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历史的经验表明,文化影响下的群体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推动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升,文化可以暂时性弥补发展过程中物质相对稀缺的不足,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对塑造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文化产业^①:“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由此,文化产业具备一定的公共属性,其发展逻辑也不应只考虑经济效益。更进一步,文化产业的产业资本化发展逻辑是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文化产业的产业资本化发展逻辑和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从基于文化行业实体调查之上的行业有效监管及优质文化存量供给的角度,提出防范资本化可能带来负效应的行业应对策略。

一、文化资本的概念界定与应用

以文化资本化作为产业发展驱动力的理论基础为文化资本的概念,普遍认为来源于布迪厄。国内对其理论最早的专著为包亚明^②主编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其中,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基本单位是“场”,人与人之间通过“场”在一定规则下进行竞争,而人拥有的各种可以在“场”里面参与竞争的资源则被看作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的阐述中,文化资本并不直接参与

张鹏,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97);周郁,苏交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南京 210017)。

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讲故事: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2020 年 12 月 17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0/1217/c64094-31969693.html>。

②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39—201 页。

商品交易,也不直接参与个体间的竞争,而是以软实力的形式体现。其积累、交换及参与博弈等过程需通过一定媒介,例如时间、金钱、社会地位等进行转化。之后,这个概念被学者广泛引用并加以丰富,从学科分类上来说主要集中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戴维·思罗斯将文化资本定义为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以外的第四类资本。其为文化资本价值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量化投资方法。^①国外研究中文化资本的经济学测量有两个侧重点,^②一是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通过参与“场域”博弈的主体的相关属性(家庭状况、收入、阶级等)进行文化资本测量;二是基于纯经济学视角,研究文化产品的供求关系、群体化投资行为与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于文化资本的研究领域与方向按照学科分类集中于经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及哲学。经济学主要关注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延伸出与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③,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④,文化资本与文化行业发展^⑤等;社会学主要关注文化资本对于阶层获得、教育公平等议题^⑥;城市规划领域关注文化资本在地理空间领域的文化资源,并进行解构与量化估值^⑦,如物质文化资源——建筑及设施、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等与精神文化资源——如生活习惯、观念形态、人与事件、社区精神等。哲学领域主要针对文化资本概念进行诠释并从哲学这个最高领域对各学科领域进行关系透视^⑧,同时亦有其他学科交叉,如政治经济学^⑨等。

布迪厄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⑩,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比较上,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布迪厄的理论借鉴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即根植于劳动价值并具有排他性,但未触及劳动剩余价值占有与剥削理论^⑪;另一种观点认为布迪厄的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观点的一种扩展与丰富,其对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的概括本身即说明文化资本的获得与转化的不公平,其背后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对立^⑫。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⑬,强调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性。而布迪厄更侧重日常生活实践的概括和感性层面的研究^⑭。

作为文化资本理论指导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大量学者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将文化资源活化为文化资本并参与市场交换。其具体表现为文化资源资本化、文化产品商业化,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以此提高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这本身是对布迪厄理论的一种现实应用,然而对这种资本化的产业发展政策的政策逻

^①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47—560页。

^②曲晓如、曾如燕:《国外文化资本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③孟召宜、渠爱雪、仇方道:《江苏区域文化资本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地理科学》2012年第12期;何林骄:《文化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自贡市盐文化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区域经济学,2018年;金相郁、武鹏:《文化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统计研究》2009年第2期。

^④田坤明:《转型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理论框架与中国情境》,博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2014年;白涛:《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2013年。

^⑤徐望:《文化资本时代的中国文化产业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第56—235页;牛宏宝:《文化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厉无畏:《论文化资本在创意产业中的作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⑥胡安宁:《文化资本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史明:《布迪厄文化资本视域下教育不公平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2013年;肖日葵、仇立平《“文化资本”与阶层认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⑦黄颖、沈默予:《基于社区资产的山地城市社区线性空间微更新方法探究》,《规划师》2018年第2期;刘阳:《基于文化资本的社区更新研究——以重庆市渝中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城乡规划学,2016年。

^⑧陈锋:《文化资本导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2005年。

^⑨陈锋:《文化资本研究:文化政治经济学构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3—618页。

^⑩匡存砍:《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若干问题》,《学术论坛》2018年第1期。

^⑪史明:《布迪厄文化资本视域下教育不公平思想研究》。

^⑫陈治国:《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2011年。

^⑬张楠楠、沈江平:《资本图绘中的马克思与布迪厄》,《理论视野》2020年第7期。

^⑭庞立生:《布迪厄与马克思:社会实践理论的契合与分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辑,极少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进行分析的。同时,基于行业管理角度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与具体措施方面的研究也缺乏。

二、文化资本概念驱动的文化产业资本化

追根溯源,文化资本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尽管布迪厄本人力图把它作为一个中性的概念进行诠释,在其原始概念阐述中并未直接提出文化资本与货币资本的转化方法。其对文化资本的定义属于现状描述,其背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社会形态。同时其暗含的逻辑为,文化资本是为“个体”的持续收益服务的,并可以进行世代的合理传递。本质上是私有资本积累的一种客观过程。如果说教育资质与知识通过“场域”进行竞争不直接涉及商品交换,表现得还不够明显,那么其现实的产业化操作——将文化资源资本化、文化产品商业化,实现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活化,通过构建市场交换体系,并最终转化为私人的货币占有,则是非常典型的资本化过程。现实博弈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议价权,且社会是网络化的复杂系统。在一个理想边界限定的“场域”内,两个理性人通过一定规则进行博弈的情况太过理想。特别是在金融资本过剩的时代背景下,现实情况更倾向于大资本在不断增值的要求下,对文化行业进行空间扩张,与广泛参与“场域”的文化小资产拥有者进行博弈。根据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由于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需通过一定的中间媒介与规则,这就使得具有经济基础与规则制定权的大资本在这场博弈中拥有绝对竞争优势。文化小资产者在这场博弈中根本没有议价权,也不具备规则制定权。只能顺从于符合大资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确认,这便符合马克思设定的那个经典场景。

资本本身的二重属性会带来正负效应,正效应为文化产业可以得到迅速发展,负效应为利润最大化的最高准则下,导致产业的盲目性与文化产品的过剩。^① 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②中认为文化资本的另一个矛盾在于文化产业泡沫化和虚拟化的风险较高,通过对差异符号的贩卖与租金产生剩余价值,同时因为参与“符号分析”可以获得较高收益,使得高层次人才充分参与,而传统劳动者前途就很黯淡了,会面临职位消失的问题,造成大量的劳动力过剩而无法短时间消纳。这本专著中详细总结了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与反映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并在一些矛盾中提出了解决方案^③,为防范文化产业资本化有可能带来的负效应提供了结构化分析和现实素材。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大卫·哈维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概括了资本的矛盾,可以看作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一种现代拓展版。马克思《资本论》重点在于资本与劳动生产关系的论述,对于精神领域并未做太多涉及,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中也只用了“人性的反叛与普遍的异化”来概括资本主义对于精神世界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给予了认识论补充,^④首先,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由各个部分之间紧密相关的整体,构成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构成主体的人、物质基础的物、由人与物相互作用派生的经济、政治等,和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社会思想,这为分析文化对接人的具体领域提供了解释框架。具体到文化产业,其所生产的产品直接对接精神与意识形态,对人价值观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效应,“拜物教”的价值观会严重威胁社会主义的既有信仰体系,继而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基础。泛私有制情况下,文化经营实体间可以选择互相竞争,也可以选择合作做大

^① 秦慧源:《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化资本逻辑批判》,《哲学动态》2018 年第 7 期。

^② [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 99 页。

^③ [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 17 个矛盾》,第 16—143 页。

^④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0 页。

蛋糕,但无论是哪一种,公共存量都得不到提升,反倒有可能减少。其次,认为产业资本化有助于提升行业生产效率,可以概括为行业扩张加速和短时间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这种效率是以很高负效应的代价换来的,且不具备整体可持续性。在局部文化产业的表面繁荣之下,很可能是精神存量的透支与整体利益的受损,包括信仰变更、政府公信力受损、人性普遍异化等。

表1 大卫·哈维概括的资本的十七个矛盾及解决方案

矛盾名称	资本逻辑所造成的问题	哈维提出的解决方案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资本逻辑到最后会演化成只针对商品交换价值的追求,投机与泡沫便无法避免,会使得大部分人享受不到商品的使用价值,特别是公共物品如教育、医疗私有化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危害	建立一个完全不仰赖市场居中调解,致力于替所有人生产使用价值,并以民主方式供应这些价值的体制
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	货币和其代表的社会劳动会存在不一致—价格信号扭曲,原因是由于货币商品化,导致追求其交换价值,同时货币成为了私人占用的社会权力,脱离了实物,导致货币的无限增发进一步加剧矛盾	攻击过度的投机活动和促进投机的货币形式,让社会劳动持续创造使用价值,杜绝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生产活动的主导作用。
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	个体私有产权的“自由”行使,国家强制监理权力的集体行使,以及将它们密切联系起来的社会纽带三者之间会产生矛盾—国家和私有产权行驶时可能会发生冲突	设法解除私有和个体利益与国家权力和利益的现行矛盾,以人民力量取代债权人的权力,建立民主的集体管理组织来管理货币与信贷。
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	社会劳动的公共财富为私人占有,基于私人占有的情况会导致对公共财富的无限搭便车,并且资本还倾向于剥夺式积累,会毁坏公共财富再生产的条件	无
资本与劳动	劳动力商品化使追求使用价值为上,产生了剥削问题,并由此不断增加资方权力;劳资双方诉求不一致,阶级矛盾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同时劳动者与资方力量对比悬殊	无
资本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	资本在固定与流通中存在矛盾,一方面追求快速流通,一方面又不得不有固定资本,而固定资本又非常的鸡肋,随时可以被抛弃	资源、土地,固定基础设施公有化,切断其与金融投机的联系
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导致被剥削者无能力消费制造出来的产品,金融信贷等中间渠道还会加剧被剥削者剩余价值的被榨取	把生产与实现的关系反转过来。以群体需要的使用价值作为生产活动的依据,基本需求的去商品化
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	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速度和能力(如垄断利润),使得工作大量消失和劳动力的富余	无
分工	分工造成阶级矛盾,造成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力量日渐悬殊,造成劳动者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丧失了作为人的一些权力	无
垄断与竞争,集中与分散	资本喜欢垄断力,而又需要竞争,两者常有矛盾,平衡常难实现	无
不均衡的地域发展和空间生产	资本发展的逻辑总会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均衡	无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	为了维持资本的再生产方式,资方与劳动者间收入必须是不平等的	缩减社会不平等的改革运动
社会再生产	资本会摧毁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如教育私有化造成劳动者负债,虚拟化会导致劳动力分化	无
自由与控制	资本发展方式需要控制,但资本本身又崇尚自由,形成矛盾	无
无止境的复合增长	资本主义追求复利增长,造成资源的极大透支与浪费,牺牲存量与可持续发展性	无
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	资本会因自己的特征改造自然,商品化自然,最终出现诸多环境问题	无
人性的反叛与普遍的异化	资本对于人的异化是全方位的,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的	无

资本发展的特征往往伴随着诸多剥削性积累、公共存量透支与公有产权侵蚀。由于资本实体本身追求最大剩余的需求,追求高流通速度、搭便车等行为,有助于其最大程度的占有收益,最小程度的承担代价,其造成的不平等与不均衡亦是常态,这就给识别资本化发展所可能造成的负效应提供了判断依据和关键指标,同时也为如何弥补资本化发展可能带来的公共存量透支提供了启示。针对

资本化发展可能产生的负效应,为了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行业管理部门需对行业进行有效监管,以避免资本概念驱动下“恶之花”的处处盛开;同时应加大优质文化的供给,以弥补文化存量的透支。

三、资本化所可能带来负效应的行业应对策略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年度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作为行业管理部门,明了资本如何进入文化产业、如何配置资源并组织生产、如何获取剩余、剩余流向何处、如何识别剥夺性资本和不可持续发展路径等问题,将是行业监管的“必修课”。而后,设计出一套切实有效的机制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以实现经济层面节制剥夺性积累,保护竞争中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打击投机行为,维护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精神层面则防范“拜物教”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关于如何监管,朱宁^①认为监管部门要实施功能监管,识别业务本质;同时亦要加强数据的安全应用和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李奇霖^②认为传统的监管框架可能会落后于市场新变化,这就对行业管理部门履行监管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行政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行业全覆盖与重点领域的日常监控需结合使用,目前行业管理部门皆有下辖的信息中心或承担类似职能的第三方机构。在明了文化产业链条的情况下,对于重点产业领域的文化行业实体建立一套日常的行业调查机制,是实施有效监管的手段,鉴于政府的公共属性与相对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督机制,数据的安全应用和个人信息隐私是可以得到切实保障的。

根据上文总结资本生产方式的一般性规律,基于剥夺式积累发展逻辑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会选择一个文化生产实体作为载体,其制造的文化产品具有“拜物教”特征,同时通过“符号”不断创造需求、租金空间与流动性。同时,基于成本的需要,生产过程是“机械化”的,消费过程是“快餐式”的。其更倾向于虚拟空间(电视、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因为这样消费上限可以扩得很大,流通速度可以提高很快且可搭公共基础设施的便车。其生产机理过程大致如下图 1 流程所示,实际过程中远要比这个复杂,因为涉及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但主要还是以加入中介、渠道或是更多资本实体参与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消费者本身也会成为文化生产者,加入文化产业链条,成为新的资本扩张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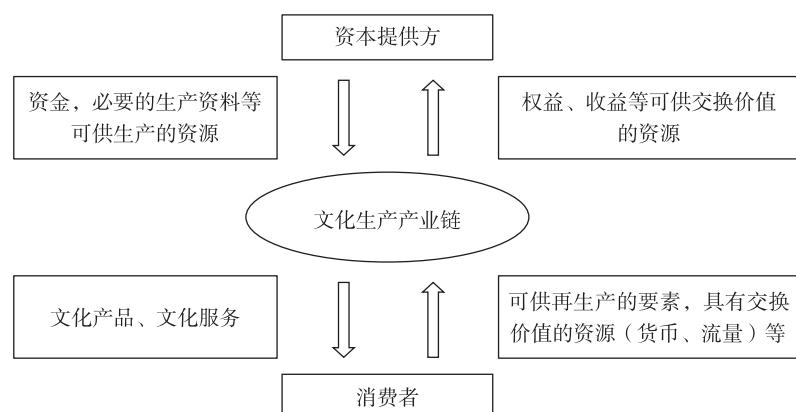


图 1 资本主导下的文化产业关系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0 年 12 月 2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7/content_5573663.htm。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根据以上特征,依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①,广播影视信息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出版服务——数字出版、数字内容服务、创意设计服务这些领域具有资本青睐的原始条件。这并不等于资本不可能通过其他领域进入,而是这些领域更具备资本快速增值的土壤。针对上文的总结,应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结合文化行业的特征,设计文化经营实体调查内容如下表2所示。

表2 文化经营实体调查内容

调查文化实体关键问题	可参考的调查内容
是否存在劳动价值与实际价值偏曲,是否存在投机与泡沫化	经营实体本金,现有资产,主营文化业务利润空间及波动,日常营收额度,文化产品成本,经营周期,盈利方式和资本积累方式,增长模式,投入再生产方式,资金流存量
是否存在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是否存在过度的私人占有	各岗位工资收入,公司与各岗位债务历史与额度,经营实体企业主与雇员的收入与待遇差距,分红方式,利润分配方式,生产资料归属,资本积累过程
是否存在侵占公共资产	资产产权及获得方式,经营过程中新资产产权属性及获得方式
是否存在劳资矛盾	企业主与雇员的收入与待遇差距,经营实体的用工与培养模式与制度,劳动仲裁数,雇员可支配收入
资本流通过程及产品生产过程	资金流来源及流存量变化,资方背景,产品生产过程
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	人员流动率,岗位变化率
是否存在垄断与竞争	经营实体数量与资产规模排序、本金、雇佣规模、资本增长率
是否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债务及产生原因,教育及培训投资,用工与培养模式与制度
人性的反叛与普遍的异化	经营实体负责人与主要文艺生产人员的政治立场、观点、职业履历,对各阶级政治影响力,对于劳动生产的态度,对于“拜物教”的态度,公司发展理念、发展历程、大事记、氛围、产品内容。

从各文化实体的角度看,发展需兼具公平与效率,既要摆脱因为“绝对平均主义”造成个体的激励不足,也要避免盲目追求短期与局部效率造成的公平缺失。从行业管理角度来说,要防止资本化可能带来的负效应。本调查方法拟从单个文化实体占有实体资产、资本积累与盈利方式、用工等角度入手,基于调查指标评估现有文化经营实体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否具有资本化风险特征——价格信号偏曲、泡沫化与投机、恶意并购、财富占有不均、劳资矛盾、经济与社会平权状况等。公平方面,拟从保证个体发展权利、劳动获得等方面入手,监控资产流向、财富分配相关指标。效率方面,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与产出价值进行评估。此外对文化实体经营性指标与发展模式的细节调查更有助于行业管理部门采取更好的帮扶政策。针对文化实体被资本裹挟可能产生价格信号偏曲、泡沫化与投机问题,采用日常经营数据、业务利润空间及波动、盈利方式及资本积累方式和产业链的整体结构变化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可能出现的泛私有化问题,以产权为抓手,确认行业公有产权边界,维护其公益属性,这也是限制投机资本扩展领域与边界的一种可行做法。人性的普遍异化采用的是对文化经营实体关键人物(如实体负责人与主要文艺生产人员)的相关立场、人格概况与影响力的评估,文化产品针对人的精神需求,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的道德观念,同时文化产品因其行业特殊性,也很难做到标准化控制。因此,主要文化产品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就显得非常重要。社会上出现的“低级红”“高级黑”现象,很大程度受文化生产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影响。毛泽东^②在《寻乌调查》中对于寻乌城的文化着重调查两个方面,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教育水平(识字率、中学毕业率等),二是看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施加文化影响的人物和团体的政治倾向与人格概况。本调查方法借鉴了这种思路,设计了文化经营实体的文化产品主要生产者的相关指标,用以把控“关键人物”的办法最大程度防范资本化可能带来的负效应。

基于文化行业的实体调查内容,借助现代信息手段——如监管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能够辅助行

^①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2018年5月9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805/t20180509_1598314.html,2020年12月10日。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9—163页。

业管理人员及时发现行业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以实现有效监管。然而，由于文化产品的广播性，现实中仍有可能出现文化消费者受“拜物教”等意识形态影响成为新的文化资本扩张节点，这就需要针对广大人民群众从供给侧加大优质文化的供给。

四、文化存量供给阵地：创造公共价值的城市社区空间

由上文概述得知，如果以资本化极端逻辑为指导的产业扩张政策一般不太会涉及存量供给，特别是短时间内无任何回报的领域。鉴于可能出现的文化存量透支，则必须通过加大优质文化供给来实现系统的平衡。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化生产方式的客观过程跟“增发预期”并无区别，消费者为了“预期”而付费。这本无大碍，但是由于文化的特殊性，预期的量无法量化，增发的量无法控制，同时如果“预期”无法兑现或者是无法投入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将会导致不可持续性。因此，产业发展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效益为先。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切切实实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有切实感悟与正向持久回报的良性文化服务是扩大文化存量的有效途径。

就阵地选择而言，除了严守既有高质量公益文化供给阵地——图书馆、档案馆、出版社等，还应扩大高质量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使其不要“高高在上”而要“走向民间”。基于这个思路，塑造高品质的地理文化空间，赋予地理文化空间更多的社会价值创造性是一种可行的思路。同时日常生活的聚集可避免族群的撕裂，增加彼此间的信任，是公共价值增值的过程。更进一步，在地化其实是在进行文化再生产关系的良性重建。通过非金钱的交换，互助式的活动，建立生活及文化共同体的形态，建立基于共同经历与“共情”长期的友谊。有批评观点认为^①，当人口快速流动，房产作为投机和交易工具，又处在社会转型期间，在地化文化建设缺乏“共情”和社会经济基础。同时需要看到，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思想深入人心，已经成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转型期间突出的各种矛盾和精神迷失更说明人们对于精神家园与安定生活的渴望，这也是在地化发展实施良性文化供给的契机。

随着经济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逐渐提升，我国传统的二元城乡结构发生一些变化。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代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和农村的边界逐渐模糊。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② 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率的逐步提升，广泛分布于社区的城镇化居民会逐步变成主流。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群组成的社会生产生活共同体，是作为良性文化供给阵地的理性选择。基于此，依托社区现有管理组织，通过建立社区文化供给阵地，让大家回归社区，产生更紧密的凝聚力，同时因地制宜通过各种方式倡导和解、互助与共享的邻里精神，让社区群众感受人文关怀，塑造新时代“城镇之魂”，是从受众价值取向角度创造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基础条件。

五、面向社会价值创造的社区空间构成及指标构建

文化景观的塑造和社会网络与其中的良性文化生产关系的建立是社区文化空间塑造的两个核心要素。相比较前者，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而在社会组织建立的过程中，组织管理机构和核心骨干又起着非常重要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其需要负责引导社

^①[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第100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7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2019年8月16日，http://www.gov.cn/shuju/2019-08/16/content_5421576.htm。

会组织朝着社会价值创造的方向发展。文化景观的塑造需要分析一个地区的相关文化构成,地域性较强,本文仅从行业管理角度出发,坚持文化空间的可持续性与公益性,参考《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①与南京部分社区活动空间一般考核项目,提出面向社区公共价值创造文化空间的解构方法。

其中经济可持续需要调查空间的提升、改造、运营、管理费用,是否在当年度总预算之内,是否有长效资金保障机制。环境可持续需要调查改造及营运过程中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能够达到相关标准,同时需满足卫生要求。社会的可持续建立在公平的维护之上,需要调查空间运营主体和参与者的相关信息,以获得确保空间主体运营机构的公平公正,各参与主体的发展机会与使用、获得的公平,设施的使用及投资也需用于公益目的。空间可持续专注流入要素如“客流量”,在设计容积范围内,以保证接待能力,以上内容相关指标设计时可倾向于约束性指标。在此基础之上,加入对于保障其公共属性与公益性、社会效益创造、能力建设和使用效率方面的评估内容,此内容相关指标设计可考虑为预期性。最终,加入精神引领,为约束性指标,精神引领相关指标与党建相关。抓住文化景观设置、符号应用及创作人的“初心”来保证文化空间塑造的质量。其具体的解构内容如表3所示。

表3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社区文化空间构成及指标体系

	可参考量化指标	可参考非量化内容
经济可持续 (约束性)	运营实体本金额度,现有资产额度,年运营费用额度、建设与设施购置费用额度、捐助费用额度	是否超预算、是否有长效资金保障机制、资金来源是否稳定
环境可持续 (约束性)	“三废”排放量及处理率、环境噪声平均分贝数、节能量	所采用节能及污染治理措施、现场卫生与否
社会可持续 (约束性)	志愿者队伍数、上级机关与评估机构考评分数、企事业单位共建项目数、廉政指数、文化社群数、读者或粉丝数	运营主体所持物品来源与流向、运营实体的历史(发家史、大事记等)、增长模式,资金使用情况,文化投入再生产方式,运营主体的用工与培养模式与制度(志愿者制等),运营实体有特色的运营方式,服务人群分类与特征,运营实体内部平权状况、参与主体平权情况、运营实体人员与参与者(粉丝)的政治立场、观点、受教育程度、职业履历,群众、志愿者是否参与管理与建设
空间可持续 (约束性)	各线路的人流量、设计接待量	参观及活动参与者相关属性(人员结构、去空间目的、偏好)
资源使用效率 (预期性)	文化服务项目数、服务时间、举办活动数	活动参与度
创造社会效益 (预期性)	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社会价值、参观人数、日均接待量、覆盖社区人员占比	群众满意度、因参观空间而改变精神状态或能力提升的案例、文化产品及周边输出案例
能力建设 (预期性)	硬件设施相关指标(图书、展板、活动室人均拥有率等)、运营人员党员占比、资产损耗率	活动质量
保障公益性与公共属性 (约束性)	公益服务面积占比、财政拨款比例、财务透明度	资金使用情况、相应公共服务性质保障及监督制度
精神引领 (约束性)	党建符号、信仰语言应用、红色文创周边、正能量事迹数	基于当地文化基因的红色信仰符号应用与景观设置、红色主题构建,“暖点”“泪点”“赞点”设置,红色文创周边质量,学习资料质量、运营主体及文化社群核心人员的政治立场与“初心”

综上,基于文化行业的产业资本化发展逻辑进行分析,资本化在提升行业生产力的同时可能带来诸多负效应。本文从行业风险防范与优质文化供给的角度,提出文化产业资本化可能带来负效应的行业应对策略。文中只提供了框架性对策,文化行业最大的特殊性在于诸多指标无法标准化与量

^①百度文库:《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2018年9月15日,<https://wenku.baidu.com/view/ef727e87c0c708a1284ac850ad02de80d4d80635.html>。

化,就文化实体调查而言,需要对相关细分领域(如创意产业)做进一步的量化与实证研究,以明确判断的量化依据,而后结合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才能提升管理效果。同时,文化景观的塑造需要对地域的社会网络及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如何将精神引领要素嵌入到文化景观中,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蒋永华)

Capitaliz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ts Impact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ZHANG Peng, ZHOU Xu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apital” proposed by Bourdieu has been widely spread and studied in academic circles. It is also adopted a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amining the capit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lated policie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mode formed by using industrial capitalization as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may bring about many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the change of public beliefs, the damage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the general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Relying on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the supervisory governmental department should establish an industry survey system to gathe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s and then implement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is is a safeguard agains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localized” community-based cultural service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quality culture to balance the possible overuse of cultural stock.

Keywords: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value; cultural industry survey; culture industry regulation; community cultural space

About the authors: ZHANG Peng, Ph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ZHOU Xun is Engineer at Jiangsu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Co., Ltd. (Nanjing 210017).